

关于圣经文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梁 工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20世纪中期以来,圣经的文学性质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圣经文学研究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圣经研究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当代学者除了继续深入研讨各种传统课题外,还借助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对这部古老经典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现代观照。从近年来国际圣经文学学会年会的盛况中可看出当今学者对圣经文学的广泛兴趣。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内地也方兴未艾,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最初几年国内学者又取得一批骄人的成果。

关键词:圣经;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传统;当代

中图分类号:I3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09)03-0073-08

在当代文化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圣经文学研究日益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一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此课题的兴趣与日俱增,研究队伍的规模也不断壮大。1880年国际圣经文学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BL)应运而生,当时会员仅45人,而目前已超过10000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日新月异之势,论文、论著和译著层出不穷,相关专题已成为外国文学教科书中的必设章节,一些高校连年招收主攻圣经文学的研究生甚至设立圣经文学研究所,校际交流乃至与境外和国外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也日趋频繁。本文试就这一领域的欣欣向荣景观发表若干浅见。

一、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

圣经文学研究之所以欣欣向荣,是因为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内在的学术生命力。圣经是基督教的元典,研究基督教必须从研究圣经起步。然而,如何理解圣经的性质?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答案。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圣经仅仅被奉为神圣真理和信条教义的载体、古犹太—基督教历史的记录和世人日常行为的指南;释经学之核心地带所关注的始终是神学及伦理学问题,文学研究只在不起眼的边缘地带发出微弱之音。所幸的是,近代圣经文学研究兴起后,圣经作为历史文化经典和文学巨著的原貌渐渐有所显露;最近半个世纪,借助于20世纪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有力支撑,一批当代学者终于使它的文学性质清晰地呈现出

来。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断言,作为古犹太—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的圣经,首先具备三种性质: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是神学—伦理学经典;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史学经典;从语言和审美角度看,它是文学经典。

圣经是一部神学——伦理学著作,这无疑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旧约》全面展示出以独尊“唯一真神”亚卫为核心的犹太教神学,涉及选民观、契约观、律法观、圣史观、先知观、末世观、弥赛亚观等。它的《新约》在扬弃犹太教神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颖的初期基督教神学:使一神崇拜演变成对圣父、基督和圣灵的崇拜,预示了日后三位一体教义的形成;将弥赛亚观发展成专释耶稣性质及其降世使命的基督观;将律法观改造成以“因信称义”为中心的信仰观;在延伸犹太教圣史观的基础上,发展出圣父舍弃其独生子以拯救世人的救赎观;从《旧约》对“上帝之灵”的记载中引申出圣灵观;从犹太教末世观引申出盼望基督再临的基督教末世观……在上述神学框架中,《旧约》表现出以公平、正义、圣洁为基本准则的富于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伦理观,《新约》则体现出以“爱”或“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主义伦理观。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

收稿日期:2009-03-20

作者简介:梁 工(1952-),男,河南省开封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迁徙,揭开希伯来民族史的帷幕。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主要记载于《旧约次经》中的)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

与此同时,圣经也是一部文学典籍。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1]即所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2]不少西方学者亦持此见,如称“文学研究不仅与文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实在和它就是一回事……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文学研究”。^[3]毋庸置疑,圣经完全合乎这种“文学”定义,因为它的《旧约》大体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主要用希腊文写成,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运用语言手段对世界的感知、认识和理解。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学”基本上与“文化”同义,用于界定圣经时,是说它类似于各种史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等著作,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这种界定显得有失浮泛,因其缺乏对狭义文学之特殊审美性质的关注。

狭义文学指近代以来人们对所谓“纯文学”即诗歌、小说、散文等的统称,基本特征在于不但诉诸语言,而且“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4]必须承认,整体上的圣经文学不同于这些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然而“狭义文学”概念对于理解圣经的文学典籍性质依然不无启迪。具体表现为,其一,圣经中的叙事文学(含神话、传说、史诗、史传文学、故事书、福音书、《使徒行传》等)和诗歌(《诗篇》、《哀歌》、《雅歌》、《约伯记》等)皆有浓烈的情感性和不同程度的虚构想象性,接近于(至少其部分篇章接近于)狭义文学;其二,除叙事文学和诗歌外,圣经中所余的先知文学、启示文学和书信文学均属于论说性散文,亦有很强的情感性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想象性,与近现代

论说文学不无贯通之处;其三,圣经中远离狭义文学定义的大体是一批星散于史传文学中的族谱(或家谱)、人名录、典章律例条文等,但它们皆未独立成卷,而是穿插于特定故事情节之中,成为某篇叙事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都有耶稣的家谱,孤立地考察家谱本身,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狭义文学,但若将其置于耶稣降生的故事情节中,它就转换为对耶稣身世的宏观概述,从而被赋予某种文学意味。借鉴原型批评大师诺思洛普·弗莱的观点,圣经全书乃是一部从上帝创世到未来新天新地降临的“神圣喜剧”:

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U形故事结构之中:在《创世记》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在此首尾之间是以以色列的故事。^[5]

在如此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中,间或出现某些非文学性要素,应当无损其总体上的文学性质。

还要强调的是,圣经的神学—伦理学经典、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性质是同时并存的,而非被孤立或单一地分配于不同卷籍或篇章中。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三种性质在所有章节中都均衡存在,就特定段落而言,往往是以一种为主,而以另外两种为辅。以“亚伯拉罕燔祭献子”(《创世记》22:1-13)为例,它既是高扬犹太信仰、引人效法亚伯拉罕无条件信奉上帝的神学—伦理学文本,也是记载犹太始祖事迹的历史文本,还是性格鲜明、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的人物故事。至于它的主导性质,学者们会从不同角度出发仁智各见,分别瞩目于神学——伦理学、史学或文学。

圣经文本的三重性质势必导致三种类型的研究。对此,勒兰德·莱肯指出:

圣经文本既然是多种文类的混合,显然,对待某个段落就能从不同视野、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除了依据三种作品类型思考问题,还必须了解三种诠释途径:神学途径主要关注某个段落中的道德神学观念;历史途径主要关注圣经作者笔下的实际人物和事件;文学途径则聚焦于文本的特色、文本基于感性经验的具象性、对各种文体的运用、素材得以表现的艺术性(对统一性的特别强调),以及文学的语言手段。^[5]

在圣经文学研究尚未引起国人充分重视而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笔者在此要说:传统的神学——伦理学研究不足以揭示圣经的全貌,史学研究

亦有待拓展;文学研究乃是不容忽略的学术视角,期待着学人予以更多关注,而强化这方面的探讨,必能大大拓宽观察和透析圣经的学术视野。

二、源远流长的研究传统

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圣经研究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大致说来,由于受到不断嬗变的时代文化思潮的制约,18世纪中期以前,人们研究“圣经中的文学”,主要是一批圣经故事和诗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开始用历史考据法从整体上揭示圣经的文学经典性质;20世纪以后,又借助比较文学和各种现代文论提供的路径和方法,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并对圣经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现代观照。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对“圣经文学”的认识一直相对狭窄,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圣经中有一批富于文学意味的故事和诗歌,那时的文学研究不过是神学—伦理学研究的附从或分支。公元3世纪希腊教父奥利金出于诠释《雅歌》寓意的需要而分析其诗体,将其解释成男女对唱的戏剧;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哲罗姆在释经过程中注意到希伯来诗歌的韵律和诗体。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于1753年发表《希伯来圣诗讲演集》,^[6]卓有成效地考察了圣经中的希伯来诗歌,论及它们的文体、节奏、类型、功能等,指出它们大多用平行体(parallelism)写成,包括同义平行、反义平行、综合平行等。

从18世纪下半叶起,受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一批学者从局部章节转向圣经整体,指出圣经乃是一部由数十卷经籍汇编而成的巨著,不但各卷有其书写、编纂、形成的特殊经历,整部圣经也有汇编、修订、增补、定型的复杂过程;圣经成书后被接连不断地誊录、抄写、翻译,并以文学研究者公认的各种方式进行阐释和解读,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经典的际遇大同小异——既然如此,对圣经理应能够着眼于它和历史的关联,进行宏观的总览和微观的细读。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一个历史批评的新时代悄然而至,且延续将近两个世纪。此间学者们“将注意力从圣经文本的叙事本身转移到对文本形成方式的解构”,^[7]关注的大体是圣经成书前的际遇;资料来源批评(Source Criticism)意在揭示用以编成最终文本的各种原始资料;形式批评(Form Criticism)意在分解构成原始资料各类传

说单元,解析其形式特征并描述其赖以流行的社会背景;编修批评(Redaction Criticism)则指出最后编纂者对原始资料的合并、汇编方式,及其在编著过程中流露出的神学信念。^{[8]-17}沿着一条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路线,一代代历史考据学者取得了多项重大成就,使圣经文本的远古面目和形成过程日益明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圣经的历史考据研究强调原始资料,注重实证,突出编纂者在著书过程中的主体性,将学术探讨建立在确凿可靠的历史根基之上。它是对中世纪神学诠释传统的有力反拨,使圣经成书前的种种暗昧经历逐渐大白于天下。然而一如其他古代经典,尤其那些浓缩了诸般民族精神的文化盛典,圣经的内涵也极其精深复杂,尚待运用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种解析。历史考据是透视圣经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大致说来,它对圣经与读者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从审美角度对圣经文本进行的封闭性考察更为不足,而这两类批评在20世纪西方文论界却相当活跃。20世纪有“理论的世纪”之称,一系列当代文论此伏彼起,相继风靡学术界,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比如形式主义、语义学、现象学、新批评、修辞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原型批评、文化阐释学、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等。这些理论中的一部分以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渗入圣经文学研究界,酿成运用新潮文论观照古老经典的种种奇观。^①

现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的又一重大动向是对圣经与世界文学相互关系的关注,亦即对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的研究,这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对于揭示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意义深远。学术界早已公认“二希”(希腊和希伯来)是纵贯西方文学史的两大大潜流,圣经与世界文学之相互关系研究所关注的,就是希伯来精神在文学史中的来龙去脉,包括圣经如何多方面接受西亚、北非、南欧上古诸族文学的影响,去粗取精而成为中东新一代文学的结晶,以及圣经成书后如何对后世欧美文学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类研究几乎涵盖所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如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约翰·班扬、歌德、雪莱、拜伦、雨果、斯宾塞、布莱克、狄更斯、哈代、劳伦斯、萧伯纳、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

① 详见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斯泰、T. S. 艾略特、乔伊斯、福克纳、奥尼尔、布尔加科夫等；重要专著可举出纳希·沙欣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资料》、^[9]杰弗端的《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词典》^[10]等。这种研究覆盖了一个重要的子课题：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圣经曾于唐、元、明、清时期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尤其19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政治、哲学、伦理、宗教和文学艺术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近现代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现原型、汲取灵感、生发意念，创作出各种带有圣经情结的著名作品，因而对这批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便在所难免地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学术方向。

三、多种多样的研究课题

当代圣经文学研究的繁荣气象从国际圣经文学学会2004年会(SBL 2004 Annual Meetings)的盛况中可见一斑。国际圣经文学学会自1880年创建后几乎每年举办学术年会，时至2008年，在128年的历史中已经举办了117届年会。最近五年来的年会分别在美国的圣安东尼奥城、费城、华盛顿城、圣地亚哥城和芝加哥城举行，每届年会正式注册且宣读论文的代表均逾2000人，他们在100多个不同规模的研讨会上相继发言，这些研讨会皆有专门的主题，相关主题又能归结为若干种讨论类型。下面依据这几届年会的会议手册，分门别类地介绍会上研讨的主题，以示当代学者对圣经文学的广泛兴趣。

(一) 关于希伯来圣经文本

涉及摩西五经研究、圣经律法研究、历史书研究、申命派史书研究、申命派律法中的性别政治研究、以色列先知文学综合研究、《以赛亚书》研究、《以西结书》的神学视野研究、先知文献与其古代背景的关系研究、十二小先知书研究、《诗篇》研究、智慧文学研究、启示文学研究等。

(二) 关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涉及《马太福音》研究、《马可福音》研究、《路迦福音——使徒行传》研究、《约翰福音》研究、同观福音研究、“Q”字原材料研究、约翰著作研究、古代文化背景下的约翰启示论研究、耶稣传说研究、历史上的耶稣研究等。

(三) 关于保罗和保罗书信

涉及历史文化中的《罗马书》研究、有争议的保罗书信研究、保罗的灵魂得救论研究、保罗与政治关

系研究、基督教神学与保罗书信关系研究等。

(四) 关于犹太教的历史和神学

涉及波斯时代的犹太历史与文学研究、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教研究、早期拉比犹太教的历史与文学研究、库姆兰社团与《死海古卷》研究、《旧约次经》研究、《旧约伪经》研究、希伯来圣经的神学研究、犹太神秘主义起源研究、以色列古代战争研究、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研究、约瑟福斯研究等。

(五) 关于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世界

涉及西亚背景下的以色列宗教研究、古代背景下的哀歌研究、埃及学与古代以色列关系研究、第二圣殿时期的社会学研究、波斯时期之圣殿与宫殿的关系研究、圣经世界中的妇女研究、亚述学与圣经关系研究、考古文献中的圣经地理与民族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希伯来圣经与其同源文学的关系研究、以色列与其同源传统中的智慧研究、圣经历史书与乌加里特文献关系研究、圣经历史书与西北闪族碑铭关系研究、以色列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智慧文献比较研究等。

(六) 关于《新约》、早期教会与希腊——罗马世界

涉及希腊——罗马宗教研究、希腊——罗马世界的食物研究、希腊道德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研究、柏拉图哲学与《新约》教义的关系研究、诺斯替主义与《新约》教义的关系研究、蒲草纸文献背景下的早期基督教研究、古典故事与早期基督教叙事文学的关系研究、福音书与罗马世界的关系研究、罗马帝国背景下的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研究、罗马时代的埃及宗教研究、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考古学、君士坦丁大帝之前教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多马福音》研究、早期犹太裔基督徒研究、早期基督徒家庭生活研究、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渊源研究等。

(七) 关于圣经语言和语言学

涉及圣经希伯来文与语言学研究、圣经希腊文与语言学研究、希伯来圣经经文考据、《新约》经文考据、圣经希伯来诗歌研究、亚兰文研究、马索拉经卷研究、《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及其同类译本研究、圣经词典学研究、圣经翻译研究等。

(八) 关于释经学、释经史、释经理论、释经方法

涉及圣经社会学研究、圣经意识形态批评、圣经生态学批评、圣经符号学批评、圣经读者接受批评、希伯来圣经的新历史主义研究、圣经与文化关系研究、圣经性别视角研究、女性主义释经学、亚洲释经学、非

洲释经学、非洲美裔释经学、释经史研究、伦理学释经研究、米德拉西与犹太释经学研究、圣经的运用和影响研究、圣经传播媒介研究等。

(九)关于圣经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

涉及圣经研究与电脑技术、网络技术、影视技术、可视性艺术创作的关系等。

此外,在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的同时,这几届年会皆召开数十个相关会议,讨论诸如《圣经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圣经文学的教学改革及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等问题。总之,从圣经文本放射出去,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无处不有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课题。

四、方兴未艾的研究实践

圣经文学的研究实践不仅在国外如火如荼,在国内也方兴未艾。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1]21世纪最初几年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又取得骄人的成绩,论文论著的数量更多,探讨的课题更加丰富,它们的学术品质也显著提高。与此相关的是,一批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建立了基督教文化、圣经文学或犹太文化研究机构,致力于展开校际交流乃至与境外院校或机构的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出版研究著作,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专题讲习班,以多种方式推动了基督教—圣经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2002年9月16日至18日,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在开封联合举办“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欧洲和北美的50多位学者从诸多角度对圣经进行学术透视,探讨其文本的独特面貌和性质,观察其文化精神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梳理它与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也研究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经理论、解经方法、重要释经学者和研究著作。2005年7月2日至6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在天津联合举办“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我国基督教—圣经文学研究的奠基人朱维之教授的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同时对基督教文化与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讨论。2008年6

月9—11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春联合举办“西方宗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圣经文学和基督教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一批新的成果。这三个会议收到学术论文逾百篇,其主题可分为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圣经文本研究。其中开封会议的相关篇目^[2]包括卢龙光的《圣经:基督教的基础——历史与诠释》、王立新的《特质、文本与主题: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郭晓霞的《该隐形象的文化阐释——兼论弗雷泽在〈旧约民俗〉中对该隐记号的研究》、陆扬的《约伯与上帝的公正》、张思齐的《〈圣经·诗篇第19篇〉与〈诗经·天保篇〉比较研究》、刘光耀的《“我”与“我——你”:论〈诗篇〉的诗学意义》、赵宁的《〈约拿书〉的神话与“非神话化”阐释》、张略的《耶稣口述传统的存留与流传》、黄汉平的《路加的叙述策略》、黄根春的《基督教经典中的文本互动:保罗如何发展耶稣传统中“爱仇敌”的教训》等。天津会议的相关篇目^①包括陈志强的《约翰〈启示录〉的政治倾向》、郝岚的《〈约伯记〉的戏剧叙事浅说》、居阅时等的《探究圣经中的植物象征义》、黎新农的《事件·文本·意义——圣经文学中所罗门诸形象浅析》、梁工的《论圣经文献中的弥赛亚观念》、林培泉的《希伯来圣经中的诗歌》、潘朝伟的《〈诗篇〉110篇简释》、杨正和的《圣经中的原始小说初探》等。长春会议的相关篇目^②包括陈南芬的《你见过牛羊披麻布而不嘴嚼吗?》、孙志刚的《敬畏:〈旧约〉的潜在叙事结构》、王鹏的《福音书“童女生子”故事重读》、张丽的《雅各传说中的情感特色》等。

其次,是圣经阐释和传播问题。其中开封会议的相关篇目包括王晓朝的《跨文化背景下的经典诠释及其对传统的影响》、孙景尧的《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杨慧林的《圣经“和合本”的诠释学意义》、张倩红的《犹太思想家对圣经的阐释》、任延黎的《梵二会议与圣经》、张贤勇的《一本圣经的生命之旅——以一个经典名词的嬗变为例》、姚西伊的《略论中国基督新教圣经观的嬗变(1807—1949)》、刘林的《新时期圣经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曾庆豹的《巴别塔与后现代之源》等。天津会议的相关篇目包括黄福光的《中国开封犹太人的逾越节

① 参见《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手册》,天津,2005年,第16—41页。

② 参见《西方宗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手册》,长春,2008年6月。

<哈加达>、李焜昌的《上帝的中国名字——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刘建军的《关于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刘意青的《圣经阐释的自由度问题》、孟艳玲的《古代以色列宗教对异教文化的吸收与摒弃》、唐小林的《汉语诗学的现代性建构与基督教》、王本朝的《基督教文化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问题》、谢品然的《创造、巴别塔、亚伯兰的呼召——解读〈妥拉〉精神中的公共性》、马小朝的《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共同文化出发点和历史观的内涵》、张仕颖的《马丁·路德与圣经解释学》等。长春会议的相关篇目包括黄根春的《据〈马太福音〉分析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张力》、李焜昌的《圣经在中国：上帝中国儿子的诠释》、黎新农的《浅析圣经的意象思维和象征文化》、梁工的《哈罗德·布鲁姆论J书》、林培泉的《跨文本阅读：〈创世记〉中的创世故事和中国古代创世故事》、刘建军的《基督宗教十字架的象征》、卢龙光的《从和合本的翻译偏差看马礼逊在中文圣经翻译上的贡献》、王立新的《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谢品然的《符号与视觉：古希伯来智慧文学的文本视觉解读》、徐家玲的《犹太民族的埃及背景探析》、张思齐的《从中世纪拉丁语文献看基督教三一学说的印度来源》等。

再次，是圣经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其中开封会议相关篇目包括肖明翰的《〈坎特伯雷故事〉的朝圣旅程与基督教传统》、程小娟的《试论〈威尼斯商人〉的双重文本》、张春蕾的《〈浮士德〉和〈约伯记〉中人文精神的联系和变异》、曾艳兵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传统》、马凌的《宇宙与上帝之心——从〈我发现了〉看爱伦·坡的观念世界》、何云波的《〈断头台〉：一个现代宗教神话》等。天津会议的相关篇目包括李晓卫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鲁滨逊形象》、孙彩霞的《〈百年孤独〉与圣经》、王海燕的《客体化的生存景象之沉迷——试论王安忆创作中的根本性缺失》、王志耕的《苏联时期革命文学中的圣经引语》、许正林的《中国现代作家抗战期间宗教意识探析》、杨剑龙的《写出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基督徒的复杂心态——论许地山的宗教小说〈玉官〉》等。长春会议的相关篇目包括高建华的《库普林小说与圣经》、侯颖的《基督教文化与安徒生童话的纠结》、李树欣的《〈老人与海〉中的基督教信仰问

题》、李晓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与宗教的关系论略》、梁坤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复活主题》等。

自然，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也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圣经文学论文，仅举数例：赵宁的《乌托邦文学与圣经》、^[13]刘洪一的《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与现代文明的联结》、^[14]杨建的《古代希伯来文学的悲喜剧性及民族意识》、^[15]梁工的《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16]以及姜桂翔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17]1-5}等。其中后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从基督教—圣经角度研究外国文学的回顾与反思，得出的结论颇具说服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个健康全新的基督教文化视角给了研究者们以灵感和智慧，他们重读经典，重构文学史，于是外国文学研究显示出灵性和光华，被赋予生命和真情，呈现出了勃勃生机”。^{[17]15}

近年来，国内举办的高规格圣经文学专题学术会议尚有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希伯来语专业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于2006年12月联合召开的《创世记》学术研讨会，和上述机构于2008年12月召开的希伯来圣经智慧文学研讨会。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朱维之主编的《古希伯来文学史》^[18]是国内第一部该专题文学史的高校文科教材，分10章详述了古希伯来文学自远古神话至《塔木德》的发展演变过程。梁工、卢龙光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①是内地和香港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大致依据文体分卷，对《旧约》、《次经》、《新约》的各类卷籍以及圣经地理、历史、正典化、神学观念、传播史、阐释史等综合知识做出分门别类的论述。梁工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8]是针对圣经叙事文学的专著，在回顾西方圣经文学研究简史并描述圣经叙事批评的理论构架之后，依次探讨了圣经叙事的人物、情节、时间、背景和修辞问题，最后对圣经叙事批评的历史和现实予以反思，亦对其未来发展做出展望。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文化丛书”是一套多卷本的基督教文化专题论著，其中的《基督教文学》^[19]对基督教的文学成就以及世界文学中的基督教—圣经元素予以全景式的描绘。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是作者近年来钻研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论文

① 梁工、卢龙光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分为六册：《圣经解读》（梁工等著）、《律法书、叙事著作解读》（梁工等著）、《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梁工等著）、《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赵宁著）、《四福音书解读》（刘光耀等著）和《使徒行传、使徒书信解读》（卢龙光著），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3至2005年陆续出版。

自选集,所录24篇论文分为3辑:“基督教神学的人文视野”、“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资源”、“文化论说中的基督教主题”,它们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当代中国学者探讨基督教—圣经文学的深广程度。李炽昌和游斌的《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对《雅歌》、《传道书》等五部圣经原著进行了高层次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论述。^[21]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2]依据对希伯来圣经原文的考据,并广泛参考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希伯来圣经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陈贻绎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则以希伯来圣经文本与近东考古学的关系研究为显著特色。^[23]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一项显著开拓是对西方圣经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研讨,刘意青的《圣经的文学阐释》^[24]就是一部这方面的力作,该书聚焦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圣经文学研究界的领衔学者艾尔特、斯腾伯格、弗莱、巴尔、韩德尔曼等,深入解析他们各自的学术代表作,将其理论和方法的精华介绍给中国读书界。梁工主编的《西方圣经批评引论》^[25]则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简史、圣经阐释学、圣经形式批评、《旧约》社会学批评、圣经女性主义批评以及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做出专门探讨。

关于圣经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近年来也有一批新著陆续问世。孙彩霞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26]便着眼于这个独特视角,对波德莱尔、叶芝、T. S. 艾略特、卡夫卡、加缪、贝克特、马尔克斯的22部名著进行文本细读,予以“具体细致又条分缕析的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现代派文学乃是与圣经的深层精神有着潜隐联系特质的西方现代文学”。^[27]梁工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28]从莎士比亚时代的圣经文化语境、莎剧与圣经的事实联系、莎剧中的圣经文化母题,以及莎剧与圣经关系的专题论述四个层面探讨了莎剧与圣经的各种关联。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29]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30]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31]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32]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33]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34]等,则是“基督教——圣经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新收获。

此外还应提到学术辑刊《圣经文学研究》^[35]的创办。这是一种研究圣经文学的专业性学术辑刊,追求运用各种传统和现代文论对圣经进行具有原创性、前沿性、思想性的文学评论,亦倡导对圣经文本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文化透视。所设栏目包括“学科综览”、“圣经与文学”、“研经理论与方法”、“文本纵横”、“《诗篇》探奥”、“中国诠释学”、“认识名家”等。它的创办得到国内外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本领域的国际领衔学者罗伯特·奥特、勒兰德·莱肯、梅厄·斯腾伯格、谢大卫、邓雅各、柯大卫、加里·伦兹博格、萧俊良等加盟学术顾问委员会,其中罗伯特·奥特、勒兰德·莱肯、谢大卫、邓雅各、柯大卫还惠赐专稿。该刊已于2007、2008年出版两辑,并将继续发表具有较高品位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以推动中国的圣经文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与国际学术界逐渐接轨。

五、小结

国内的圣经文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又有不少可喜的新收获,一批青年学者在境内外院校钻研圣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且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国内的学者队伍,为本领域的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然而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还远未达到能与国外同行对话的水平;要想达到这一水平,尚有漫漫旅途需要跋涉。一个显见的差距在于我们的学者大多不懂圣经的原始语言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以及与圣经研究密切相关的拉丁文、亚兰文、埃及文、亚述文等,而离开这一语言基础,就难以摆脱对翻译资料或二手材料的依赖,以致难以实现根本性的飞跃而取得前沿性成果。就此而言,务必大力加强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继续着眼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之真正具备坚实的圣经语言功底、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做好一系列相关工作,诸如强化图书资料建设、扩大与海外同行的沟通与对话等,以求在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等方面不断迈出较大的步伐。同时,致力于拓宽理论视野,以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透视古老的圣经,应当成为深化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此外还要牢记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谋求在跨文化的学术碰撞中不断提出新课题,形成新思路,走出新路子,而不能总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可以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地探索出一条富于民族特色的学术创新之路,中国的研究成果必能尽快

与国际接轨,得到国际圣经文学研究界的充分认可。

参考文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70.
- [2]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字论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美]韦勒克.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7.
- [4]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 [5]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M].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14.
- [6]Robert Lowth. Lectures on the Sacred Poetry of the Hebrews[M].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5.
- [7]D. F. Tolmie, Narratology and Biblical Narratives: A Practical Guide[M].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1-2.
- [8]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17.
- [9]Nasseb Shaheen. Biblical Reference in Shakespeare's Plays[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David Lyle Jeffrey.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M].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11]梁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圣经文学研究综述[M]//曹中建.1999—2000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337-362.
- [12]梁工,卢龙光.圣经与文学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13]赵宁.乌托邦文学与圣经[J].外国文学评论,2001(2).
- [14]刘洪一.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与现代文明的联结[J].外国文学研究,2004(6).
- [15]杨建.古代希伯来文学的悲喜剧性及民族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2004(6).
- [16]梁工.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J].外国文学评论,2008(4).
- [17]姜桂栩.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M]//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欧美文学.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1-15.
- [18]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9]梁工.基督教文学[M]//卓新平.基督教文化丛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20]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21]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22]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23]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 [24]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5]梁工.莎士比亚与圣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6]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7]孙景尧.别开生面的西方现代派名作解读[M]//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 [28]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9]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30]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 [31]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32]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
- [33]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34]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35]梁工.圣经文学研究:第一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